

[编者按] 1949 年,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普及科学知识” 被写入《共同纲领》, 中央人民政府在文化部设立专门的科普管理机构——科学普及局, 将科普工作纳入新政府统一管理的轨道, 新中国的科普事业开始了高起点的发展历程, 经历过辉煌也遭受过挫折。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新中国的科普事业在党的有力领导下走过了 70 年, 70 年来, 科普工作始终围绕着国家的中心任务, 在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值此历史时刻, 为传承也为发展科普事业, 本刊特设“新中国科普事业回顾与展望”专题。本专题从新中国 70 年来科普政策、科学素质的发展演变、社区科普、基础设施科普、科普概念等方面, 回顾了科普事业的发展历程, 展望科普事业的发展方向和途径, 以为科普事业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思路。

新中国科普政策 70 年

任福君 *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863)

[摘要]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70 年来, 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科普政策, 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国家、部门、地方三个层级的科普政策体系, 有力推动了科普事业的蓬勃发展。本文系统梳理了 70 年来我国出台的科普政策的历史背景、主要类型、主要内容和实施效果等, 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我国科普政策体系变迁的历史过程。从进一步完善科普政策体系、提升科普政策效应、强化机制建设、创新科普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我国未来科普政策体系建设展望。为新时代科普事业进一步跨越式发展, 提供政策依据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 中国 科普事业 科普政策

[中图分类号] N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9.05.001

科普政策一般是指政府为促进科普事业发展, 并通过推进科普工作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公民目标而制定并付诸实施的行动准则、方案、措施等。科普政策主要包括国家、政府及部门颁布的科普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政策性文件以及有关部门的章程、制度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1]。其目的在于利用政策手段建立科普工作的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立科普事业的目标和战略、确定科普工作的任务和计划、引导科普资源的合理配置、活跃社会的科普局面, 利用科普工作服务国家科技、经济、文化、教育目标和高素质人力资源建设目标, 促进科普事业的全面发展。

早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就开始了有组织的科普工作,

收稿日期: 2019-09-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科普产业相关基础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证应用研究”(71473021)。

* 通信作者: E-mail: renfujun@cast.org.cn。

延续到了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而且不断发展壮大，为新中国的科普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为科普事业蓬勃发展创造了从来未有的历史机遇。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科普政策体系，为推动科普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必要系统梳理研究我国的科普政策体系。

1 我国科普政策的发展演变

在我国，早在19世纪末西方先进科技传入之际就开始了相关的科技传播与普及活动，但是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科普政策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给予科普工作以高度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出台了许多推动科普事业发展的法规政策，初步形成了包括国家、部门、地方三个层级的科普政策体系。从专门出台科普政策，到近年来系列政策出台，科普政策体系不断健全。我国科普政策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重要时期^[2-3]。

1.1 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的科普政策（1949—1976年）

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没有专门发布关于科普的政策法规。对于科普事业发展的指导和定位最早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其他法律、法规、中央会议精神以及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和指示中。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即新中国第一个科学组织和第一个科学技术普及组织。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成为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管理者。1953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对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工作领导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的宣传，不但对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破除迷信保守思想有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后国家大规模建设时期，劳动人民学习科学技术的要求将日益增长，群众性的科学普及工作必将有更大的发展。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了“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在此背景下，《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科技十二年规划》）草案于1956年8月完成，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它标志着我国的科技事业走上了以科技政策为指导的有计划的发展阶段。《科技十二年规划》中提出，为了加速高级科学人员的培养，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原则下，采取多种多样的有效措施。这个规划体现出科学普及工作是促进科学技术工作的重要手段。

1958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并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中国科协管理。在中国科协的6项具体任务中，专门把学术交流和科技普及作为两个基本任务^[4]。1962年春，周恩来总理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科协的任务。

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蓬勃发展的科普事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除

了少数科普活动（如华罗庚先生推广“黄金分割法”等）之外，我国的科普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1.2 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科普事业恢复重建时期的科普政策（1977—1992 年）

1977 年后，我国的科普事业进入了恢复发展时期。全国科学大会于 1978 年 3 月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而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强调“必须大力做好科普工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向大会作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报告，就如何“大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普及主体、普及方式和普及对象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并强调要用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新科学技术成果，要在全社会造成一个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气。我国科普事业再次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

中国科协组织了一些有影响的科普活动和青少年科技活动，成立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等专门学会，设立了中国科普研究所，加强了基层科普组织建设，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科普网络。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科普事业迎来新的发展高潮，科普图书、报刊、影视等作品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科普发展陷入低迷期，已有的科普政策发挥的作用也比较弱化。这一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整发展以及在经济变革中出现的许多不足，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新的“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科普事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科普宣传和科普创作在兴旺了 10 年之后受到了冷遇，科普阵地日渐萎缩，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5]。科普事业呼唤新的科普政策早日出台。

1.3 科普事业快速发展格局渐趋成熟的科普政策（1993—2001 年）

我国科普工作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以及各部门、各地区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普工作的法规政策。

1993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第 6 条明确规定：“国家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第 42 条规定科学技术社会团体应当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99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论述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该意见强调了加强科普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今后科普工作的任务要求，同时提出了要促进科普工作群众化、社会化、经常化、法制化、制度化。科普被置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科普逐渐步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95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将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列为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强调加强科学技术的宣传和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全国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和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要求，制定本地区的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出台促进本地区科普工作的措施。随着国家、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各地区出台科学技术普及相关政策和措施，我国科普政策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迈出体系化建设的重要步伐。

1996 年 4 月，为加强对科普工作的领导

和管理,国家建立了以国家科委(科技部)为组长单位,中宣部、中国科协为副组长单位的国家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1996年,中宣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共同召开了全国科学普及工作会议,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同年,中宣部、中国科协等10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1999年,科技部、中国科协等9部门联合发布《2000—2005年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纲要》,强调要从事关现代化建设成败和民族兴衰的战略高度认识科普工作,把提高国民科技素质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石,把发展科普事业作为科技创新、素质教育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2000年,科技部、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等5部门发布了《2001—2005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等等^[1]。

1.4 科普事业法制化、体系化发展的科普政策(2002—2015年)

我国科普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体系化、法制化的建设之路,科普工作被逐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02年6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科普法》通过法律形式确立了科普工作的属性、任务、内容和科普活动方式,规定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组织、科技部门、科协等组织以及公民在科学普及方面的权利、义务、职责和责任。《科普法》指出,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保护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其自主开展科普活动、兴办科普事业,并对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进行了原则规定。《科普法》的颁布是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延续和深化。

《科普法》的颁布实施为科普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带动了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2003年,中国科协、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科技馆等科普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宣部、中国科协等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修订后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将科普成果列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励范围;2004年,国土资源部、科技部联合提出《国土资源科学技术普及行动纲要》;等等。

2005年底,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建立科普事业的良性运行机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根据这一明确要求,也为了有针对性、有目的、有步骤地提高全民科学素质,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科学素质纲要》是我国科普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文件,也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方面第一个系统性的纲领文件。《科学素质纲要》对2006—2020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做出了全面规划,提出了科普工作开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任务与措施等,成立了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科学素质纲要》颁布后,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和相关部门围绕或结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需要先后出台了许多政策和措施,落实《科学素质纲要》、加强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成为近些年来科普政策的基本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根据《科学素质纲要》要求和地方科普工作发展需要,出台了相应的科普政策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措施^[1]。

随着《科普法》的颁布和《科学素质纲

要》)的实施,科普成为政府推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科普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繁荣发展时期。

1.5 科普事业全面战略升级的科普政策(2016年至今)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将科普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保障之一。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6]这个讲话把科普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地位。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的要求。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向科学家提出“继续在传播科学知识上学为人师、在弘扬科学精神上身体力行”的要求。2018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发出贺信,高度评价增强公众科学素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7]。

面对新时代科普信息化引领创新发展的新形势,在2014年中国科协就发布了《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的意见》,认为科普信息化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带动科普升级的必然趋势,是对传统科普的全面创新,强调科

普信息化要聚焦科普需求、丰富科普内容、创新科普表达和传播形式、拓宽传播渠道,推动信息技术和手段在科普中的广泛深入应用,推动信息化与传统科普的深度融合。

2016年3月,中国科协出台《中国科协科普发展规划(2016—2020年)》,决定实施“互联网+科普”建设工程等六大工程,强调以科普信息化为核心带动科普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整体水平的显著提升。科普信息化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科协推进科普工作的一项战略举措,成为新时代科普工作的核心、龙头和新引擎^[8]。

这些文件和讲话为科普工作确立了基本定位和基本方向,也确定了我国科普政策的基本基调和基本目标。这些思想和理念将在新时代推动科普政策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推进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的科普工作机制逐步形成,促进科普环境和社会氛围不断改善。

2 我国科普政策梳理及实施效果

2.1 70 年我国科普政策梳理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数据中心梳理了1949年9月至2019年8月我国科普政策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开出版物,包括《中国科普法律法规与政策汇编》^[9]、《中国科普法律法规与政策汇编1994—2018年》^[10]、《中国科普政策法规汇编(1949—2018)》(上下册)^[11];二是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政策法规数据库。通过提取关键字、数据筛选、数据清洗、去重及人工研判后,得到有效数据373条。

各阶段科普政策发布数量见表1。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我国发布的科普政策较少;2000年以后,随着《科普法》和《科学素质纲要》的颁布实施,带动了相关科普政策文件的出台,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发布的科普政策快速增加,如表2所示。

表 1 我国科普政策发布数量情况 (条)

年份	1949.9—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9.8	合计
中央 / 国家部委政策	4	1	2	7	20	76	113	223
地方政策	0	0	0	0	8	28	114	150
合计	4	1	2	7	28	104	227	373

表 2 2000 年以后我国科普政策发布数量情况 (条)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中央 / 国家部委政策	2	12	6	7	2	6	11	11	8	11
地方政策	3	2	2	3	0	3	3	4	2	6
合计	5	14	8	10	2	9	14	15	10	17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8
中央 / 国家部委政策	4	18	10	2	9	13	25	24	3	5
地方政策	4	21	13	6	8	7	40	11	3	1
合计	8	39	23	8	17	20	65	35	6	6

1949—2019 年我国科普政策发布年度情况如图 1 所示。其中,中央层面(包括国家部委及中央领导人讲话)发布的科普政策 223 条(占 60%);地方层面发布的科普政策 150 条(占 40%),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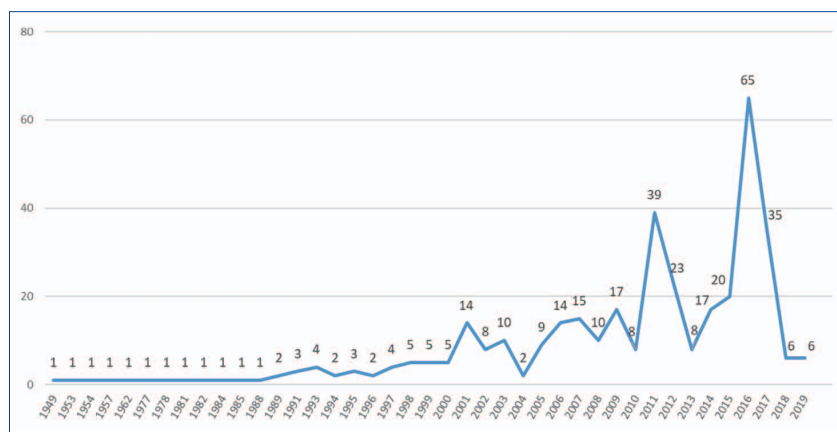


图 1 1949—2019 年我国科普政策发布年度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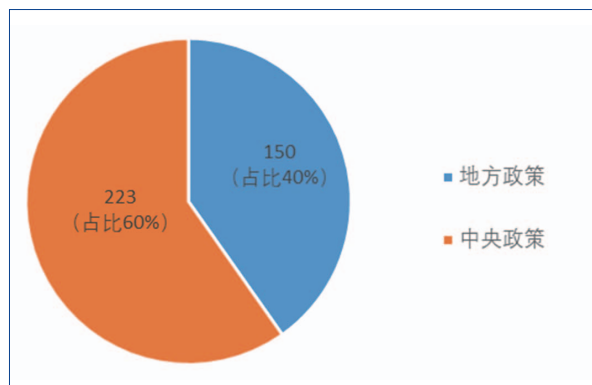


图 2 1949—2019 年我国中央和地方科普政策发布情况

2.2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变化

我国科普政策的不断完善及有效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以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变化为例,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定期开展全国性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至今共开展了 10 次

全国调查,分别于 1992 年、1994 年、1996 年、2001 年、2003 年、2005 年、2007 年、2010 年、2015 年、2018 年举行。调查结果如表 3 所示^[2]。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差距较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已经超过了 3%;而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始终徘徊在 0.2%~0.3%。到 2005 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已经分别达到 14.1%、17%、18%、27.9%;而我国 2005 年才达到 1.6%^[12]。但是,近些年来,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如图 3 所示,可以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一定会超过 10% 的目标。相信随

表 3 我国历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

年份	1992	1994	1996	2001	2003	2005	2007	2010	2015	2018
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 (%)	0.30	没有计算	0.20	1.44	1.98	1.60	2.25	3.27	6.20	8.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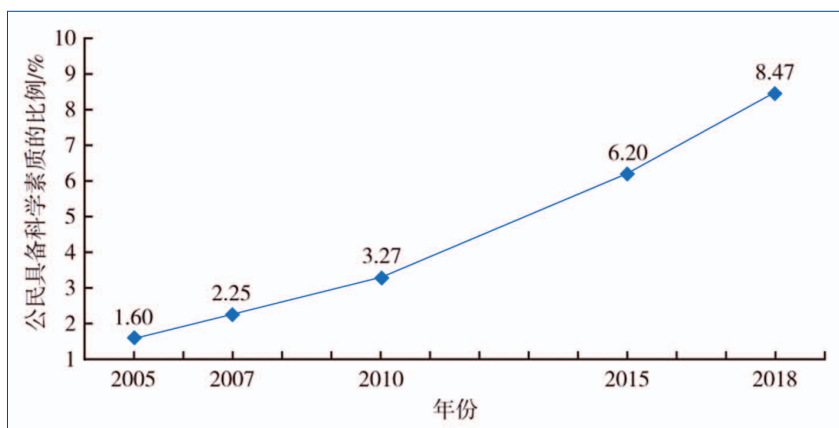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变化情况

着科普事业向纵深发展和科普政策实施效应的显现，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还会不断提高。

3 我国科普政策的主要类型

国家和政府的科普政策通常由针对科普

法规、规划、纲要、办法、意见、通知、决定、领导人讲话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普政策体系。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这些科普政策分成以下几大类^{[2][13]}。如表 4 所示。

表 4 我国科普政策的主要类型

分类标准	主要类型	简要说明
按发布主体或层级分类	国家级的科普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及其代表机构颁布的涉及科普内容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党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科普内容的讲话
	部门科普政策	国家（中央）部委或其他机构（如中宣部、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协等）独立或联合颁布的涉及科普内容的相关政策
	地方科普政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方党委或政府发布实施的涉及科普内容的政策
按内容和功能分类	专门科普政策	专门科普政策是指专门针对科普和科普事业发展制定的政策，或是针对具体领域制定的科普政策
	科普相关政策	科普相关政策是那些包含但并非专门针对科普的法规政策，科普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即涉及科普内容的其他相关政策
按文本形式分类	法律法规	法律化的科普政策
	政府文件	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科普或与科普工作相关的决定、条例和文件等
	领导人指示讲话	国家领导人涉及科普内容或科普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讲话；政府相关管理机构负责人针对科普工作的指示、讲话等
按政策目标分类	促进科普的政策	国家和政府用来促进科普事业发展、推进科普工作的政策
	利用科普的政策	国家和政府用来利用科普服务国家、社会、公民目标的政策

3.1 按发布主体或层级标准分类

根据发布主体或政策层级，可以把科普政策分为国家级的科普政策、部委颁布的科普政策和地方科普政策。

国家级的科普政策属于“顶层”政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及其代表机构颁布。例如，《科普法》《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科学素质纲要》，等等。

党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科普内容的讲话。这些涉及科普内容的讲话通过中央、国务院发布，往往成为中央、国务院部委或地方制定相关科普政策法规的依据。例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等。

国家（中央）部委或其他机构颁布的相

关科普政策属于部门科普政策。如中宣部、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等独立或联合颁布的相关科普政策。例如，中宣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科技部、中国科协等部委联合发布的《2000—2005年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纲要》，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中国科协发布的《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08—2010—2015）》，环保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等等。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方党委或政府发布实施的科普政策属于地方政策。例如，各省颁布的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协工作的意见等。

3.2 按内容和功能标准分类

科普政策按其所涉及的内容或不同功能可以分为专门科普政策和科普相关政策。

专门科普政策是指那些专门针对科普和科普事业发展进行指导、规划，提供政策导向与保障的政策。例如，《科普法》《科学素质纲要》《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或是针对具体领域或某方面的工作制定的科普政策，如科普产品税收政策、科技类博物馆等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政策、《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08—2010—2015）》等。

科普相关政策是那些包含但并非专门针对科普的法规政策，其中的某些内容与科普有关。例如，《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的科普政策，等等。

鉴于当代科普发展涉及复杂的支撑结构和保障条件，有些科普政策在内容上可能涵

盖多方面的科普工作，属于一般性政策；有些政策则可能只针对某方面的科普工作，属于专门化政策。前者通常承担更多宏观指导的功能，后者通常承担更多细化任务的功能。

3.3 按文本形式分类

从文本形式上看，我国科普政策可以分为法律法规、政府文件、领导人指示讲话等。法律法规即法律化的科普政策，如《科普法》；政府文件包括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科普或与科普工作相关的“决定”、“纲要”、“意见”、“条例”、“办法”、“通知”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等领导人涉及科普内容或科普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讲话，政府相关管理机构负责人针对科普工作的讲话等。

3.4 按政策目标分类

从政策目标上看，科普政策可以分为促进科普的政策和利用科普的政策两类。前者是国家和政府用来促进科普事业发展、推进科普工作的政策，后者则是国家和政府用来利用科普服务国家、社会、公民目标的政策。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既是科普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科普工作的基本目标，鉴于这种特殊关系，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相关的所有政策都属于科普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专门科普政策和科普相关政策为例，根据表1和图1的统计，1949—2019年我国发布科普政策373条，其中专门科普政策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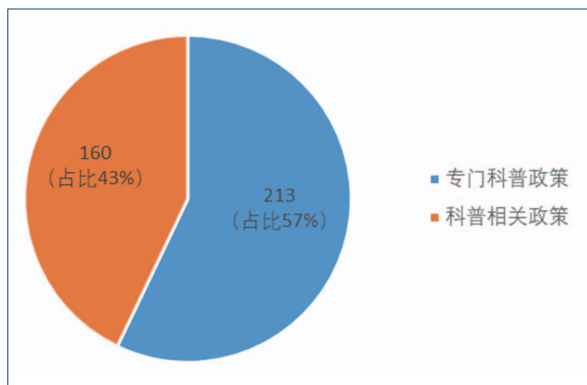


图4 专门科普政策和科普相关政策发布情况

条（约占 57%），科普相关政策 160 条（约占 43%），如图 4 所示。

4 我国科普政策的体系化建设展望

国家和政府通过制定完善的科普政策并有效执行，可以推进科普工作领域的体系和机制建设，营造良好的科普环境和氛围，激励社会各界对科普工作的支持和参与，从而达到更加良好的效果和目标。

在我国科普政策领域，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科普法》《科学素质纲要》三大纲领性文件为核心，体系不断健全，覆盖面不断扩展，包括“国家—部门—地方”三个层级的科普政策体系。随着我国科普事业向纵深发展，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将会出台更多针对设施建设、人才培养、能力提升、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专门政策，不断完善科普政策体系。

我国的科普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得以初步确立。我国未来科普政策的发展将会主要集中于进一步健全科普政策体系、提升科普政策效应、强化机制建设、创新法制建设等几个重要方面^{[2][14]}。

4.1 完善科普政策，健全政策体系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科普政策体系，需要全面分析科普事业、科普工作、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发展的要求，提炼这些发展要求的政策需求，完善现有的法规政策，制定新的政策措施，扩展政策体系的覆盖面，建立互相协调、具有横向和纵向体系化特点的政策体系。

横向体系化，要求根据科普发展需要，通过制定和出台新的政策，消除政策空白点，特别是要在科普信息化建设、网络科普、科普产业发展、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科普的积极性等方面，出台系统化的政策措施。纵向体系化，要求在明确相应政策的同时，制定具体的配套制度，提出更为具体的推进措施，

保证政策得到切实的执行和落实。

4.2 细化制度安排，提升科普政策效应

现有的科普政策在诸多制度的安排上规定得比较原则、比较概括，以至于在实施中，诸多制度落实和贯彻起来比较困难，许多政策的效应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政策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弱、配套制度建设不到位等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甚至某些政策还停留在“政策呼吁”的层面，无法使政策内容最终落到实处。

科普政策是国家和政府推动及管理科普工作的重要手段，在制度安排和规定上不能虚化，注重政策的可执行性，注重制度设计的微观化；在政策内容上更加注重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政策手段和执行力度方面不能弱化，注重政策执行的严格性和可检查性。同时强化配套制度和落实措施的出台。

4.3 强化科普机制建设，注重政策导向

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机制建设已经有了重要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完善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科普事业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进一步推进科普社会化工作格局，进一步强化社会激励和动员机制建设。

科普事业的发展需要利用政策手段，通过社会化的激励、动员、引导机制建设，有效调动社会组织、公司企业的积极性，发展科普领域的 NGO 和 NPO 组织，壮大科普文化产业，利用社会和产业的力量推进科普事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出台推进政策和措施，促进形成政府、科技、社会、产业等多元推动的科普发展模式。

4.4 完善科普法规，创新法治建设

为了更好地发挥对各类科普主体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应尽早制定《科普法》实施细则或进一步修订《科普法》，结合我国科普发展新趋势和各类主体在科普工作中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其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形式、履

行方式、承担的责任等,增强科普法制的执行力,促进科普法制的有效贯彻和实施。

科普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新兴领域推动着科普法制创新。随着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知识化和网络化,科普工作也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推进和深化,一些关键领域和新兴领域急需科普法制的创新^[15]。比如,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对网络科普作品的创作、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新媒体以及大数据的发展对大众传媒科普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当代科技发展的民生化趋向对科普的民生化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法制创新要求,等等。

5 总结

科普政策的目的在于利用政策手

段建立科普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立科普事业的目标和战略、确定科普工作的任务和计划、引导科普资源的合理配置、激励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和参与科普工作、规范各类科普实践活动,推动科普事业发展。

文章从历史的维度、客观的角度,研究了我国科普政策的历史背景,梳理了1949年至2019年70年来出台的科普相关政策数量及结构,分析了科普政策的主要内容、主要类型以及实施效果等。提出我国未来仍需进一步完善科普政策体系、细化制度安排、提升科普政策效应、强化科普机制建设、注重政策导向、创新法治建设等政策体系建设问题。旨在抛砖引玉,引发同行、相关决策部门和机构对科普事业的关注和研究,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参考文献

- [1] 任福君. 新中国科普政策的简要回顾 [N]. 大众科技报, 2008-12-16.
- [2] 任福君, 翟杰全. 科技传播与普及教程(修订版) [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103-104, 209-220.
- [3] 任福君, 尹霖, 等. 科技传播与普及实践(修订版) [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2-7.
- [4] 佟贺丰. 建国以来我国科普政策分析 [J]. 科普研究, 2008(4): 22-26.
- [5] 申振钰. 中国科普历史考察(连载) [N]. 大众科技报, 2003-02-18, 2003-03-20.
- [6] 习近平.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7] 任福君. 我国科普40年简要评述 [J]. 科学通报, 2019(9): 885-890.
- [8] 杨文志. 科普供给侧的革命 [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218-225.
- [9] 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司. 中国科普法律法规与政策汇编 [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3: 5.
- [10]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 中国科普法律法规与政策汇编(1994—2018年) [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8.
- [11] 中国科普研究所. 中国科普政策法规汇编(1949—2018)(上下册)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9.
- [12] 杨文志, 任福君, 等.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发展报告(2006—2010年) [M].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1: 113.
- [13] 刘立, 常静. 中国科普政策的类型、体系及历史发展初探 [C]// 中国科普理论与实践探索——2009《科学素质纲要》论坛暨第十六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文集.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9: 220-224.
- [14] 张义忠, 任福君. 我国科普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J]. 科普研究, 2012(3): 7-15.
- [15]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协关于网上科协建设的调研报告 [R]. 2016-10-06.

(编辑 张英姿)

China'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olicies in the Past 70 Years

Ren Fujun

(National Academy of Innovation Strategy, Beijing 100863)

Abstract: 2019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past 70 years.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CPC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hina has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hich has initially formed a policy system covering the state, departments and local level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main types, main contents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China'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olicies over the past 70 years, and objectively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ange of China'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olicy syst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China'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olicy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further improving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olicy system, enhancing the policy effect, strengthening th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innovating the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o on.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policy basis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a;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olicies

CLC Numbers: N4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9.05.001

From Inheritance to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Survey of Scientific Literacy

He Wei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Upon the historical new er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hina's 30-year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change from concept to index,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from academics to policies. This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practice of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China's 30-year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Survey, which experienced the changes from merely introducing the contents' translation version of other countries to truly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s, from studying related subjects to making policy as support, from following other countries to leading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innovation. This paper strive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our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assessment so as to make its indicator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hina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dicators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citizens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whole world.

Keywords: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survey; indicators

CLC Numbers: N4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9.05.002